

因「張我軍文集」的出版而想起

■ 曾文明

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產生正值日據的後半期，從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張我軍先生在「臺灣民報」第二卷第二十四號發表「糟糕的臺灣文學界」一文後，正式展開，迄今已過半個世紀了。

當然，這個運動能够產生，主要還是受了當時祖國大陸胡適等人所領導的新文學運動的刺激，更加上當時臺灣本身存在著的一些客觀

問題：如政治社會改革的要求、舊詩人的墮落……等。因了這外在與內在因素的相互配合，雖然比起當時祖國大陸要遲了多年，臺灣的文學終究也走上這條必須走的道路，它的產生也絕不是偶然的。

對於這一代生長於臺灣的青年而言，他們絕難想像到臺灣前輩作家們身處日據時代那種艱困的創作環境，並且對他們的文學成就感覺

陌生。因為這段史實距他們久遠，他們感到的只是茫昧。反而，對於當時祖國新文學運動的發展情形知道的要更詳細，因為關於這方面的研究論文與專著，在短短幾十年中數量甚為可觀，藉著這些，使他們至少能够獲取相當程度的瞭解。反觀臺灣的新文學運動，所能看到的有關研究它的論文，數量本來就很少，而且多半是發表於早年，除非

是刻意去尋求，否則極難得一睹。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臺北文物」

第三卷第二、三期所推出的「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民國四十三年八月、十二月），由於執筆者都是當年參加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健將，因此這兩期便成爲一項極重要的參考資料。此外「臺灣文獻」第十五卷第一期（民國五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有廖漢臣先生編的「臺灣文學年表」（迄於民國三十四年），在此我願對這位前輩作家的精神表示欽敬，雖然這份「年表」有一些因疏忽而造成的錯誤及遺漏，但它確實給人在研究的參考上有莫大的方便。另外較有系統的敘述要算黃得時先生的「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觀」（連載於臺北文物第三卷第二、三期、第四卷第二期，不知有否完結）。除此之外，未曾見過

早年有關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研究較具規模的論文，更遑論專著了。

已故本省籍詩人吳瀛濤先生在「臺灣新文學的第一階段」一文中，曾如此說過：「……而今，其資料文獻等，已甚難搜集；且以日文寫作部份，今後也將漸難被下代接受。於此，臺灣新文學過去業績的介紹翻印或研討，及其整理保存，實爲臺灣文學界當前的任務。」（臺北文物第三卷第二期）這是吳先生二十年前的話。然而，即使到今天，這段話仍然值得我們深思。二十年來，關於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的研究成績並未完滿，讓人翹首以待的一部具有系統性的專著仍未出現。我曾嘗試分析其原因：這項工作是繁重的，僅資料之蒐集便極爲不易了，而年輕的一輩更由於某些條件的限制（如最主要的對於日文

的隔閡），因此這便不是他們能力所能完成的。至於年老的一輩，則因多數已不再從事文學工作，又以爲不便由自己來論定自己。所以在如此情況下，從事這方面的探討的人也就很少了。葉石濤先生於「文星」第九十七期（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發表「臺灣鄉土文學」，其中曾對幾位前輩作家的作品風格做了簡略的評述。又曾於「臺灣文藝」第十二期（民國五十五年七月）發表「吳濁流論」。吳瀛濤先生發表於「幼獅文藝」第二一六、二二一期（民國六十年十二月、六十年五月）的「概述光復前的臺灣文學」，只是札記式的片斷記載。陳少廷先生在「大學雜誌」第五十三期（民國六十一年五月）上發表「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強調臺灣新文學運動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

一環，也是「五四」前後的文學革命的一個支流。這幾篇文章也許曾一度使得某些人注意及臺灣的新文學運動，却沒能引起更多人廣泛的注意。

最近兩年來，情況似乎有顯著的改變。自從民國六十二年七月五日，張良澤先生應臺灣大學所舉辦的暑期文學研究會之邀，首次發表「鍾理和論」後，這位「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曾於「中外文學」、「文季」、「書評書目」、「臺灣文藝」以及「中華副刊」上被人熱烈地討論過，因而使得不少素昧平生的人重新認識了他的作品。此外林載爵先生更於「中外文學」第二卷第七期（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發表「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達與鍾理和之比較」，揭示了楊達的抗議與鍾理和的隱忍，同是紮根

於我們的鄉土之上。張良澤先生於今年二、三月發表「吳濁流的社會意識」（中外文學第三卷第九、十期），對這位「亞細亞的孤兒」描寫臺灣光復以前的作品，做了深入的探究。於此之前，林載爵先生又於「文季」第三期（民國六十三年八月十日）發表「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回顧」，這是一篇有心之作，試看作者曾於前言中說：「……以沉重的心情寫這一段歷史，也只是表達一點對先賢的敬仰之意，因為由這些近代的文化志士所透視的精神裏，我們看到了祖先經營臺灣的血汗，以及作為中國人的臺灣同胞在反壓迫、反黑暗的過程中所顯露的不屈意志。」然而，自「文季」停刊後，未再見林先生繼續發表過這篇「回顧」，深感遺憾。

去年為臺灣光復第二十九週年

，大學雜誌社於十月二十五日在出版協會舉辦了「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與抗日運動」座談會，由該社長陳少廷先生主持，參加人數有十九人，其中包括王詩琅、郭水潭、蔡德晉、黃得時、楊雲萍等幾位臺灣新文學的前輩作家。座談會記錄刊載於翌月（十一月）出版的「大學雜誌」第七十九期。楊雲萍先生曾在座談會上提到研究臺灣文學應具有的態度：其一、是要站在當時日據時代的觀點去看，先瞭解民國十幾年前後臺灣的背景，然後才去批評研究當時臺灣的文藝運動。其二、才是站在今天的立場去分析、研究。他認為持著這兩種態度去研究，才是客觀合理的。黃得時先生也希望青年們研究臺灣文學要注意兩點，第一：切忌率爾貿然執筆，應先搜集完備的資料，認識人物，

熟讀作品，瞭解時代背景及其對後代的影響。第二：評斷某人作品的文學價值時，要客觀、完整地看他在整個文學潮流中的地位，切忌只以他個別的作品就輕下論斷，甚至於將之捧上天，都難免貽笑大方。

婁子匡先生主持的東方文化社，一直從事影印絕版的期刊的工作，如今已有很好的成績，對於學術研究，貢獻頗大。去年曾影印出版「臺灣民報」，自第一號至第四百一十號（民國十二年四月十五日至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九日），分為三十一冊。這實在是一項盛舉，雖然未包括發行日刊（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以後的數年（事實上要影印這一部份，可能存在的不少的困難），倒已為研究早期的臺灣新文學運動提供了一份最原始的資料（另外該社目錄上有臺灣民報之前

身：臺灣青年及臺灣兩種，不知已出版否）。筆者認為這種工作不僅是為當代做，實際上也正為了後代而做，倘若此時不做，經不住歲月的侵蝕，這些史料終歸泯滅的，如此豈不為時代的一大缺憾。因此，我很盼望我們的社會中有一家不純以營利為目的，具有識見的出版機構，能從事於這些臺灣新文學史料的影印或蒐集工作，並且除了影印出版外，最好進一步將史料分類彙編，如新舊文學論戰的文字，就很有編集成冊的價值。

在日據那種環境中從事文學創作既屬不易，作品的出版可想而知是更難了。筆者曾查閱過「臺灣省通志稿」的「學藝志」，發現光復前出版的文藝作品（不包含舊詩集）竟不及十種，當然我們不相信只此幾種而已，可能有更多是以日文

寫作出版的。不過，這情形總是令人不能滿意的，如此有限的幾種，即使現在我們想找它們來閱讀，已經非常難求了。因此，為了讓我們這一代的青年能明瞭上一代為文學耕耘的成果，似乎可以將其中幾位較富成就的（如賴和、張文環、龍瑛宗、呂赫若等人）代表作品選編出版，若是日文作品則更應該將它們譯成中文，當然這必須由對於中、日文均有相當修養的人來做。前輩作家楊逵先生這兩年中曾發表了他早期的幾篇作品，其中有經他親自由日文改訂譯成中文者。今年四月，臺南大行出版社為他出版「鵝媽媽出嫁」短篇小說集（由張良澤先生編）。由於有如此具見識（須知楊逵先生自日文譯成中文的幾篇小說中，有昔日曾屢遭退稿者）的出版商，使得我對於那幾位前輩作

中華文藝

元月號要目

■辛鬱・來自海外的汚蔑（晨鐘集）

■于還素・施友忠教授二度和諧說的商榷

■孫岳等・盧克彰、管管專訪

■張拓・副班長滋味（代馬翰卒手記）

■胡品清・大學生活憶語（話當年）

■掌杉・中國現代詩的成長及其時代意義

■林柏燕・溫庭筠的悲劇

■本社・痼弦批評集錦

■華岡散文特展

——渡也／古正中／陳照鴻／向陽／陳容／于子

■林鍾隆・少年偵探團（德·吉都納斯著）

■另有朱介凡、段彩華、畢璞、吳友詩、王怡、

何曉鐘、溫瑞安、孫瑋芒……等人的作品，內

容極為堅實。

■每冊特價廿元，全年二〇〇元，兩年三八〇元

■郵撥一七一三九中華文藝帳戶。

■社址／台北仁愛路二段九十五號之一

■總經理／星光書報社（台北中華路）。

家的作品重行問世，深具信心。

最近（八月），純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張我軍文集」，由他的哲嗣張光直先生所編選。書中的第一部份便是張先生當年倡導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幾篇主要的論文，由這些論文當中，我們可以見到他提倡新文學的那股熱烈之情，這位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鋪路者，將在臺灣新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是毫無疑問的。「文集」的編者說：「我之編集這個選集，是因為別人還沒作過，而我編起來也許比別人要來得方便些。」我覺得除此之外，應該還有個更重大的意義：這樣做是紀念先人最好的方式。

多少年來，前輩作家們逐漸凋落了，固然會令人產生無限的感傷，為了他們在那段「被弄歪曲的歷史」中所做的見證，表示我們崇高的敬意，賦與他們的文學生命以再生，是我們所應該做的。筆者對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運動並未有深入的研究，只因對於此項研究滿懷關切，深深盼望「臺灣新文學史」能早日完成，所以就我所知道的，隨意寫成這篇文章，除了抒發自己的關切之情外，並期望能獲致更多人來共同關心。